

不寻常的大使

——忆张闻天出使莫斯科



张闻天

(1900~1976)

1950年1月调入外交部。

1951年4月至1955年1月任驻苏联大使。

张闻天担任驻苏联大使，始自1951年4月，迄于1955年1月，总共将近4年时间。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外交还处在开创时期。我国执行“一边倒”方针，同苏联的友好合作在我国的国际关系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闻天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资历出任驻苏大使，在当时是颇受各方注目的。

在闻天出使苏联期间，我一直和他朝夕相处。对外我以大使夫人的身份活动；对内我是参赞和使馆特委副书记（闻天兼任特委书记）在使馆党的工作方面协助闻天。对于闻天这4年的工作情况，应该说是有所了解

的。不过毕竟时隔久远，许多事情记忆已不尽可靠。这里只拣印象较深或托人查证了材料并同有关同志核实的的事情略记一二。

就 任 前 后

中央要闻天出使苏联是1951年2月的事。一年以前，闻天被任命为我国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由于美国的阻挠，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未能恢复。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武装侵略台湾以后，我国席位的恢复在相当时期内更无可能。中央考虑，要让原来准备去联合国的同志担负更急需的工作。此时恰逢王稼祥同志要求辞去驻苏大使职务已获中央批准。周恩来总理建议闻天担任驻苏大使，或到准备组建的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工作。闻天考虑，既然做外交工作，就要到使馆第一线去。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中央选择闻天担任驻苏大使，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闻天早年就对国际问题有兴趣，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期间更是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密切关注世界风云的变化。他代中央起草的许多文件都有对国际形势的准确概括。延安整风之后，闻天卸去了原在理论宣传部门的领导职务，主持中央政治材料室。我们住在枣园，与毛主席、恩来同志等为邻。闻天利用当时能够得到的有限材料，研究国际形势。在他主编的党内刊物《参考资料》上用“记者”名义写了一系列文章，评述当时的国际大事。后来在东北做地

方工作时，他对国际问题的关心仍未中辍。他当时亲笔所做国际问题大事记有幸保存至今。他早年曾去日本和美国考察留学，后来又在苏联学习 5 年，不仅英文、俄文能够运用自如，而且对国外生活特别是苏联情况十分了解。他到莫斯科担任大使，确实具备不少有利条件。

闻天的新职确定以后，履任手续办理得相当顺利。3 月 12 日，驻苏使馆临时代办曾涌泉会见苏联副外长佐林，按国际惯例就闻天的任职征求苏方意见。5 天后 佐林代表苏联政府通知曾涌泉表示同意。3 月 21 日，正式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闻天为驻苏大使的消息。4 月 6 日 周恩来总理批准闻天任外交部分党委驻欧特派代表，领导我国驻欧洲各国使馆党的工作。4 月 13 日 我们一行 10 人就乘飞机离京了。聂荣臻代总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长余心清，团中央书记冯文彬，以及外交部、公安部、文化部的许多同志都来机场话别，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夫妇等也来送行。那天飞机在伊尔库茨克停留，次日又在鄂木斯克过夜，15 日到达莫斯科。佐林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雅斯诺夫、莫斯科城防司令辛尼洛夫中将等人以及东欧各国使节和印度使馆人员都到机场迎接。以色列当时还未同我国建交，它的使馆人员也赶来欢迎。

这样，我们又来到了阔别多年的莫斯科。闻天初到莫斯科是 1925 年。他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1 年 2 月，他和尚昆同志一路，从莫斯科经绥芬河、哈尔滨、大连回到上海。我则有两段在莫斯科生活的

经历。从 1929 年春到 1932 年冬，我先后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习近 4 年。1937 年 11 月，我又和贺子珍、蔡树藩、钟赤兵等同志到苏联治病，直到 1939 年回国。这次再到莫斯科，闻天是整整 20 年后故地重游，距我最后一次离开莫斯科也有 12 年之久了。这 10 至 20 年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当年都是 20 来岁的年轻共产党员，受党的派遣，到莫斯科学习革命道理，渴望着学好本领回国参加炽热的革命斗争。如今革命胜利，新中国昂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闻天作为新中国的使节，代表着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重新踏上这座他所熟悉的城市。我以前在莫斯科学习和治病时，尽管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也绝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会以新中国驻苏大使夫人的身份重返这里。我们来到莫斯科，既是踏上新的征途，又是凯旋故地，虽不像许多初到莫斯科的年轻同志那样欢欣雀跃溢于言表，内心也是感奋不已的。

闻天一到莫斯科，就立即投入我们完全陌生的实际外交工作。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闻天就去拜访佐林，商谈递交国书事宜。第三天，我们在使馆内将递交国书的仪式演习了一番。转入外交战线，这是我们初次上阵，大家不敢有丝毫懈怠。闻天带着所有参加递交国书仪式的人员将各自的举动和站立位置认真操练了一遍。我虽不必参加递交国书，也在一旁欣赏了这次预演。

4 月 18 日，即我们到达莫斯科后的第 4 天，闻天就递

交国书了。苏联外交部礼宾司长库拉任科夫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的专车前来使馆将闻天接往克里姆林宫，由什维尔尼克接受国书。使节到达驻在国首都后这样快就被安排递交国书，确是对中国使节的特殊礼遇，当然这更表明当时中苏两国的关系非同一般。

除了作为国家使节持有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国书，闻天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持有刘少奇以中共中央秘书长名义写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的介绍信。这封信也交给苏联方面了。

使 馆 建 设

递交国书以后，闻天便开始作为大使进行活动。首先是进行了一连串的到任拜会，接着又照顾以林老（伯渠）为首的中苏友协参加苏联“五一”节观礼的代表团，为他们举行饯别酒会。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闻天着重解决的还是使馆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是使馆的方针任务和内部建设问题。

闻天广泛地了解了使馆的工作现状和干部的思想情绪。当时使馆建立已经一年半。在王稼祥首任大使的领导下，使馆在机构、人员方面已经搭起了架子，同志们初步熟悉了使馆的生活环境，对使馆工作中的一般礼节活动、交际宴请和文书事务已经能够应付，也就是说，使馆工作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是，使馆除了外交技术性事务性的工

作以外还应做些什么，大家并不清楚。使馆又远离祖国，感受不到国内政治生活的蓬勃朝气。加以一些同志不懂俄语，同周围的苏联社会无法沟通。这样，不少同志就感到使馆生活寂寞无聊，苦闷孤独，甚至觉得是被流放在“孤岛”上。有些爱发牢骚的同志还说，大使馆、大使馆，就是“大使”的公“馆”，当大使可以在这里休息养病。或者说，使馆有 4 个人就够了，因为 4 人便可凑一桌麻将。

闻天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觉得要做好使馆工作，首先要解决同志们对使馆工作的认识问题，而对使馆工作的认识又是同对驻在国的认识相联系的。5 月 4 日，闻天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这正好是我们到莫斯科以后的第 20 天。闻天对使馆过去的工作成绩和问题做了说明，宣布了今后使馆的工作任务和方针。会后，又召开了民主生活会，让大家对工作充分发表看法。在这些会上，闻天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同苏联团结友好的方针，强调应该以尊重苏联、加强中苏友好的精神进行对苏联的外交活动，批评了轻视苏联的成就和经验、只看苏联的缺点、对苏联的作用估计不足等思想情绪。他指出，随着中苏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使馆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工作会日益增加。驻苏使馆处于世界政治中心之一的莫斯科，加强对苏联的研究并向国内做及时的与正确的反映和报道，就更为重要。要完成这些任务，使馆的同志们必须加强学习。闻天就这样批评了那种认为在使馆无事可干的“孤岛”思想。

驻苏使馆的工作初步整顿之后，闻天就受中央和外交

部的委托，以外交部分党委驻欧特派代表的身份，到东欧六国巡视我国驻这些国家使馆的工作。1951年7月25日出发，依次到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9月15日回到莫斯科前后历时50天。这次巡视，我也参加了。同行的还有李汇川。行前由外交部通知了这些使馆，让他们向驻在国通报闻天的简历（特别介绍他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说明他将作为我国大使的客人来驻在国。我们每到一处，吃住都在使馆，同使馆同志们朝夕相处，同使馆的领导干部充分交换看法。那时一个使馆不过20来个人，我们每处都要住个把星期，了解是相当深入的。

我国驻东欧六国的使节，是1950年7月至10月陆续派出的，到闻天巡视时已经工作了一年左右。这些使节原来都是我军高级将领，在革命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他们中不少同志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些同志在解放前曾参加过军调部等工作，有过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党中央调集这些同志，让他们率领年轻一些的同志（包括一些参加革命不久的年轻知识分子）组成新中国外交战线第一支驻外机构队伍，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这些同志毕竟是第一次干外交。尽管中央对于使馆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有过原则指示，大家也都赞成，但是遇到某些具体问题却似乎又忘了这些指示。闻天根据他

的实地观察，觉得这些使馆共同性的问题主要是两个，即贯彻执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友好的方针问题和明确使馆的工作任务问题。这也正是他在驻苏使馆感觉到的问题。他在每个使馆都向全体同志作了报告，阐述了他的看法。

本来，我国驻东欧各国使馆陆续派出前，外交部都曾交代过任务。除执行代表国家的职责、宣传我国成就外，也强调驻外使馆要了解驻在国情况。但是，使馆建立伊始，大家的注意力首先集中于那些为外交代表机构生存和活动所必需的礼节性、事务性的外交业务，即在同驻在国各级机构及其官员打交道、发展来往中的请客吃饭、送礼应酬等等。使馆同志们从未接触外交，首先要学会交往礼仪，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少同志不自觉地误以为这就是外交工作的全部，因此或者只是忙于请客应酬，或者觉得外交没有意思，这就不对了。闻天认为，外交干部应该学会外交技术业务，但是不能“仅仅在外交技术业务上打圈子”。特别是经过一年的工作，使馆已经初步学会了礼节性、事务性的外交业务，作为使馆生存之所必需的条件业已具备，就应该将使馆工作提高一步，“把使馆今后工作的重心，转向于研究与报道驻在国的内部情况及其国际关系（国际问题包括在内）”。应该提高使馆工作的政治水平，并且在工作中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

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友好是“一边倒”方针所决定的。驻东欧各国使馆身处第一线，当然要把团结友好方针落到实处。这一点，大家在理论上都

赞成，实际上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当我们的同志在驻在国看到一些不如人意的现象或我们不习惯的事物时，便会流露出一些情绪，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他人，或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而对人之所长则视若无睹。闻天对这种情绪十分警惕。他一路巡视，愈到后来愈感觉问题的严重性。他觉得，这种对于驻在国的轻视和不尊重，这种带有若干狭隘民族主义和非国际主义色彩的表现，虽然还只是零碎的、片断的、直觉的、盲目的，但却是危险的，应该迅速克服。他在使馆反复对此进行分析，要求大家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贯彻国际主义精神，以便能够同驻在国人民团结友爱，珍视他们的奋斗历史，关心他们的成就创造，学习和研究驻在国的情况，吸取他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闻天回到莫斯科后的第三天，即向外交部写了巡视东欧六国使馆情况的 4000 字报告，其中着重写了他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看法。外交部十分重视这一报告，将它发给驻苏联东欧使馆，作为对他们今后工作的“补充指示”，并且就此给他们写了专门指示，要求“切实克服对驻在国在各种问题上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看法”，并把使馆工作中心“逐渐转向研究与报道驻在国内部情况及其国际关系”。这份文件经周总理和少奇同志审阅，毛主席最后批示：“这个文件看过，很好，照发。”

闻天的巡视和外交部的上述指示推动了驻东欧各国使馆的工作。许多使馆加强了对驻在国情况调查研究工作的领导，设立了机构，配备了干部，干部中的不健康情绪得

到克服，工作积极性大为提高，使馆工作走上了目标明确的轨道。使馆许多同志对此都有体会。当时的驻匈牙利大使黄镇同志生前曾说，闻天的巡视帮助明确了应该往什么方向努力。耿飚同志当时任驻瑞典大使，他后来在纪念闻天的文章中也提到闻天的巡视报告“有力地推动了使馆工作”。

闻天在东欧巡视中提出的使馆方针问题和工作任务问题，也就是他在驻苏使馆初步整顿中所强调并在 4 年大使任内始终紧抓不放的问题。他主持起草的《驻苏联大使馆 1951 年工作总结报告》（1952 年 2 月 15 日）对这两个问题作了比东欧巡视报告更进一步的发挥。从对驻在国团结友好的方针和研究报道驻在国情况的任务出发，这两个文件还对使馆如何正确代表我国的国家立场、使馆内部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工作、党的工作、学习和外交干部的培养等问题，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见解。

闻天对于驻外使馆工作的这些纲领性意见，以及他在驻苏使馆的实践和对东欧的巡视，不仅使苏联东欧使馆的工作登上了新台阶，而且对整个驻外使馆的建设也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从闻天担任驻苏大使到现在的 40 多年中，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同苏联（及其解体后的国家）东欧国家的关系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对于这些国家的看法在不同时期也有许多明显的变化。但是，如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便会觉得闻天确实抓住了使馆工作的主要矛盾。至于

闻天对于使馆基本任务和内部组织机构等所做的规定，更是一直沿用至今，虽有不少充实发展，基本框架并未改变。对于当时处于草创阶段、工作尚无定规的我国驻外使馆建设，闻天是作出了独特贡献的。

1952 年外交部召开第一次使节会议，闻天因故未能回国出席，我代表驻苏使馆参加。曾涌泉同志即将出任驻波兰大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驻苏使馆建馆初期即任使馆首席参赞，对闻天到任后强调对苏联团结友好、批评“孤岛”思想、狠抓调研和学习、健全内部组织和制度等一系列做法极表赞成。他在使节会议上发言着重讲了这一问题。⁴⁰年后，他在纪念闻天的文章中再次赞扬闻天这一段工作，并且称闻天是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外交工作的杰出改进者和领导者”。他的评价是有分寸的。

外 交 大 事

闻天担任驻苏大使的几年，正值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的时期。两国在政治上相互配合和支持，在经济、文化领域中密切合作，交往频繁。当时两国友好合作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大概要算在解决朝鲜问题、印支问题上的战略配合和苏联对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援助了。这样的大事当然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直接掌握的，不仅所有重大问题都由中央决策，就连带苏联方面的谈判、磋商不少也由周总理出面。但是，闻天作为驻苏大使，处于同

苏联接触的第一线，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些大事，尽了自己的努力。

闻天就任驻苏大使不久，恰逢美国因在朝鲜战场上遭受打击而公开表示希望大体沿三八线停火，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希望苏联从中斡旋。中央研究了局势，派高岗、师哲陪同金日成秘密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协商。闻天没有参加这次协商，但是同高岗、师哲保持密切联系。在他们从6月11日到17日停留莫斯科的一周内，几乎每天或隔一天就同他们见面，向他们提供关于朝鲜战争的报刊消息，并为他们代发给毛主席的电报。同时，闻天让驻苏使馆刚刚建立的研究室收集美、英、苏各方活动情况和舆论，写成调研报告，预测美国所追求的是：单纯的停火，并且采取由军人谈判的形式，以避免涉及承认中国等政治问题。这一报告于6月20日报送外交部，受到周总理重视。他指示这类报告应以电报发回，不能等信使递送。

1952年8月17日至9月22日，周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苏。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同斯大林磋商朝鲜停战方案。会谈结果，在朝鲜和战前途、战俘问题的处理方案，以及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等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看法。闻天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代表团的所有重要活动：同斯大林多次会谈，参加斯大林同秘密访苏的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的会见，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三次会谈，出席斯大林的宴会和苏联方面的重要礼宾活动。闻天还为周总理的访问举行了招待会。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闻天当时在国内述职，立即随同周总理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就在这次丧葬活动期间，苏联新领导人向中国方面建议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便实现朝鲜停战。周总理回国后中央反复考虑，同意了这一建议。

1954年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掌握这项重大斗争。闻天作为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的工作。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周总理于4月1日至12日秘密访问苏联，同苏联领导人共同分析形势，协调两国立场。闻天参加了周总理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人的全部会谈。日内瓦会议期间，闻天参加了中苏两国首席代表周总理和莫洛托夫之间的几乎所有磋商。作为总理的助手，闻天还陪同他参加了会议以及同其他国家代表的一系列会谈和礼宾活动。在周总理离开日内瓦期间，还有几天偕同李克农同志主持代表团的对外活动。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又随同周总理访问了民主德国、波兰、苏联。

顺便说一句，除了参加中苏在国际斗争中协调立场的上述一系列谈判外，闻天还受中央和外交部委托主持了一些外交谈判活动。例如，中国同南斯拉夫建交，就是由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维迪奇在1954年10月13日向闻天提出，经中央10月18日授权，由闻天出面谈判并达成协议的。又如，在1954年10月西德加入北约后，苏联于同年11月13日建议召开欧洲国家会议，讨论保障欧洲和平和

安全问题，邀请中国政府派观察员出席。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为此于 11 月 13 日、18 日、22 日三次会见闻天，进行磋商。11 月 29 日会议开幕，闻天受命代表中国政府与会并发了言。

在苏联对我国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援助以及与此相关的两国经贸事务方面，闻天参与的程度更深些，所起的作用也更大些。

闻天就任驻苏大使时，中苏经贸合作关系已很密切。1950 年商定的苏联援建的 50 个项目正在陆续实施，向苏方延聘专家、委托设计、订购设备等业务已全面展开，我国商谈这些业务的人员云集莫斯科。1952 年初，中央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年 8 月周总理、陈云同志率团访问莫斯科，除商谈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外，着重听取了斯大林对我国编制“一五”计划的意见。前面已经说到，闻天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全部会谈。周总理、陈云同志回国后，李富春同志率团继续谈判，到 1953 年 5 月 15 日同苏方签订协定，双方商定将苏联援建项目增至 141 项。1954 年 10 月又增至 156 项。所有这些项目当然由国内各工业部门、厂矿企业协同外贸部门组织落实，但是驻苏使馆对于各部门派来莫斯科商谈业务的人员实行统一管理和政治领导。闻天为此加强了商务参赞处的力量，请外贸部长叶季壮同志派李强同志来领导商参处，并另增配 4 名商务参赞。他还建议各工业部门派出重要的技术负责干部作为总定货人代表，参加商参处工作。闻天自己则听取各定

货小组同苏方谈判情况的汇报，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有重大情况和问题，他亲自向毛主席、周总理写报告。闻天还过问国内派出的商务代表团的谈判。他曾领衔与李富春、叶季壮、李强、江明同志联名致函毛主席、周总理等，就如何答复苏方所提 1953 年中苏易货总货单提出了处理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闻天不仅处理了中苏经贸谈判中的大量事务，还根据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过一系列受到中央重视的建议。

1952 年 1 月 16 日 闻天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 就我国的工业化方针问题提出建议。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编制，如何实现工业化尚在酝酿之中。闻天研究了苏联经验，又研究了国内送去的各种资料，在信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他的意见第一是要利用最新科技成果，优先发展重工业，“把我国工业化的基础放在现代化重工业之最新的科学技术的成就的水准之上”。第二是把自力更生同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援助密切结合，在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日用机器、工具方面尽量自己设计、自己生产，在我国力所不及的领域则依靠苏联的援助。闻天在外援中只提苏联的援助，当然是当时西方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现实所决定的。第三是工业化有把握以较快的速度实行，但要根据新中国的现有条件“稳步前进”，否则是“一种急性病”。2 月 8 日 周总理亲笔草拟复电说：“你所提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方针及许多具体意见都是很好的，我们正在

为此方向努力。”毛主席、少奇、朱德、陈云同志圈阅认可了周总理的复电。

闻天还针对两国经贸交往的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提过一些改进建议。1952年1月24日，闻天致电周总理反映，“商务代表团的许多请示都得不到答复，有些问题要再三催促才得到指示。”闻天认为，同驻在国的交涉问题迟迟不得答复，不但影响工作及时进行，而且对驻在国也是欠缺礼貌的表现。他提出，“请示报告制度如果不同答复请示制度相结合则还是片面的对工作仍然不利”。同年1月25日，闻天又致电周总理并毛主席反映，苏方认为我们在商务谈判中多变，以及对我们在委托设计和订购成套设备时要这样不要那样有意见。闻天希望对此加以改进。周总理1月28日对这两份电报复电说：“电中基本意见都是对的”，同时指出，“惟工业设计与贸易订货中间的情况尚有某些出入，已请陈云同志邀集有关部门同志研究后给你具体答复”。后来中财委党组干事会2月18日专门开会，讨论了闻天的两份电报和1月16日来信。陈云、一波、富春同志向中央报告“同意闻天同志的基本精神”并且规定了12项办法，“以改进工作中的缺点”。

1953年9月，闻天检查商参处的工作，要求注意研究和解决工作中带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根据闻天的意见，商参处的总定货人和一些负责同志总结委托苏联设计、成套设备定货和聘请苏联专家等方面的工作，分别写出材料。闻天认为，这些材料“对国内有关部门也有用处”，因此陆续

报送计委并报中央和主席。1953 年 11 月 2 日报送的《关于委托苏联设计中的一些问题与意见》反映，委托苏联设计的项目往往事先缺少研究，提出后又变动。有的变更厂址，有的增加生产能力，有的矿因储量不够没有开采价值而取消。1953 年 5 月 15 日协定签订前委托设计的项目 87 个，竟有 37 个提出后又取消。在委托设计时提交的原始资料常有不准确、数据自相矛盾、翻译错误以至字迹不清、装订马虎以及不能按时提交等问题。苏方设计交付我方后，我方又常不能按合同要求的期限批准，以致影响下步设计。在此以前，闻天还就实习生问题写过一信，主张将重点企业的领导干部成龙配套地派往苏联实习，以便实习完毕回国后即能承担企业管理任务。1954 年 1 月 5 日，闻天又致电计委并报周总理和毛主席，反映我方未能按规定于 1953 年底将苏联援建的 28 个国防企业和 39 个其他企业的设计任务书提交苏方或答复苏方询问，希望对此加以催促，以免影响这些项目的设计、设备交付和建设，甚至影响五年计划的完成。这些总结和建议，都如实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对于改进工作是有益的。

闻天关心苏联援建项目的落实，关心国内的经济建设，反映了他对经济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早在东北工作时期，闻天就提出，在东北全境解放和土改完成以后，“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为此，他曾着力研究经济建设方针和一系列政策，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得到中央肯定。他还